

第二章 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 與特性

第一節 前言

依據目前中國大陸的學制，高等技職教育隸屬於高等教育。然而，中共政權建立之時尚未有高等技職教育，其創設的時間則遲至1980年才開始。從歷史與社會發展的角度而言，另一種教育型態的出現自然有其獨特的因素與背景，基於此種觀點自然有必要對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作概括性的討論，以了解高等技職教育的創設時空背景與因素，並可於依據相關的研究發現，加以討論一些存在中國大陸高等技職教育應注意的問題。所以本章主要的內容重點在於探討以往國內研究者，對彼岸大陸高等教育所從事的相關研究：

第二節 國內相關研究

關於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發展歷程的劃分，國內現有的研究數量並不多，而且這些研究者似乎並未有一致的觀點。以下僅針對鄭得興、黃政傑、楊深坑等學者較具參考價值的研究加以討論：

首先，鄭得興（民84）認為高等教育發展期的劃分，可以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分水嶺，因為在此年之後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有明確的方針，而高教發展在於配合經濟的政策，所以在1978年的政策轉變，對彼岸高等技職教育發展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他進一步將高等教育的發展區分為三個段落五個小時期，其內容如下：

1.1957年以前的史達林模式與恢復、過渡時期：由於中共掌政後

急於將中國引導至社會主義的社會型態，但又無治理全國性事務的經驗，而且其政治意勢形態來自蘇聯，在此情況下很自然的便以蘇聯的建設模式為依歸，所以中共所執行的建設方針直接反應出史達林模式，其特徵是呈現高度集中的計劃。處於這種政治大架構下的高等教育，其發展亦呈現蘇聯化的特色。例如在體制上，大陸高等教育所進行的四次院系調整，所依據的是蘇聯的高等教育制度。關於教師與研究生的培訓，蘇聯為中共所培養的研究生與教師更高達 8,285 人。在教材方面，在當時中共高等學校便採用 1,393 種蘇聯譯本的教科書。

2. 界於 1958 - 1978 年之間的毛澤東模式：在此一時期毛澤東的個人觀點，主導了中國大陸政治與經濟的發展，由於在這段二十年的歲月中，中國大陸的政策發生三次重大的變化，所以又可區分為三個次階段。

2.1 1958 - 1960 年間的大躍進時期：在 1960 年以前被稱為大躍進時期，主要的原因是在 1958 年 5 月中共當局決議，分別以五年及十五年的時間超越英國與美國，所以大陸的經貿政策採行極度危險的大躍進策略。如計劃將鋼鐵的產量從 1,050 - 1,200 萬噸間，提高至 2,500 - 3,000 萬噸之間，這種決議便產生土法煉鋼的現象。這種盲目追求高度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危機是，大量人力投注於無關民生的社會群眾運動上，最後造成嚴重的經濟危機。如從 1959 到 1961 的三年間，國民所得與工業生產值分別下降 28%、34%。當時的高等教育亦受到大躍進的波及，如在 1958 年 9 月中共當局決議，以十五年的時間來普及高等教育，所以大量興辦高等學校，在該年便增設八百餘所高校，在校學生比前一年擴增三分之二。這種現象明顯的指向高教品質的危機，在急速數量的擴張下，社會並無法提供對等的師資品質，這種情形將造成爛竽充數的惡果。是否政府能提供適當的學校軟硬體設備，亦是令人存疑。特別是在 1958 年 8 月時，中共中央決議中央只辦理高等教育中的綜合大學或工業學院，其

餘如農、醫、師範學院等皆交由省市自治區管理。在原本中央財政已不充足的情況下，很難期望地方會對高等學校作大額的投資，何況當時全國正致力於如何的大躍進。再者，匆促的政策也顯示出，大陸當局領導人的個人主觀想法主宰社會的運作，在此種情形下教育很難有妥當的發展空間。總結而言在大躍進的風暴下，高等教育的發展猶如春秋戰國時期所呈現一片混亂的情形。

2.2 1961 - 1965 年間的調整時期：接下來自 1961 到 1965 年間高教進入調整期，調整的原因主要是大躍進拖垮整個大陸經濟，為應付此種日益惡化的情勢，1961 年召開的中共第八屆九中全會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新方針。在中國大陸的一元化社會中，高教的發展自然必須遵循黨的決策，所以當時的高教亦邁入調整的局面。這也不難理解何以中共教育部分別在 1961 年 7 月與 12 月，對高校進行大幅裁併，並縮小裁後學校的規模。在這種政策下，高校數量急速萎縮，到 1963 年只剩 407 所，比起裁併前 1960 年 1289 所，只剩不到三分之一 (31.6%)。

2.3 1966 - 1978 年間的文革時期：從 1966 年到 1978 年間的文革時期，屬於毛澤東時期的最後一個階段。在 1960 年代初，由於毛澤東急於以階級鬥爭的手段，來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與改造，以將中國大陸推向共產主義的理想境界。然而，這種觀點又與當時擁有可觀政治勢力的劉少奇相左，所以文化大革命便在這種政治鬥爭的陰謀下引爆。結果文化大革命對整個中國大陸產生根本性的破壞，如在 1966、1967 與 1968 年間的工農總產值，連續下降 9.6% 與 4.2%。這種經濟蕭條直接造成財政收入劇減的困境，顯然高等教育的預算亦受到波及。除了經費問題外，許多社會的精英在這一波的政治鬥爭中被清算鬥爭。如在 1966 年 5 月林彪與江青等人導演的黑線專政論，對許多有高級知識份子扣上反學術權威的帽子，加以迫害。教育界自難幸免，甚至高校遭到裁撤，在 1965 年仍有 434 所到 1971 年只剩 328 所，總共減少近四分之一 (24.4%)。其中原有的六所法政學院全部無法倖免，十八所財政學院只剩兩所。更離譜的是原本四到六年的大學學制，被縮減為二到三年，高校生、本科生與研究生分別遭到停招、停招四年與十二年的命運。總計文革

十年期間的破壞力，單就高教而言，研究生減少十萬人，大專學生更高達百萬人以上，這些影響在未來造成社會人才的斷層。

3.1978年之後的鄧小平時期：1978年之後中國大陸進入鄧小平或是後鄧時期，主要原因在於毛澤東於1976年辭世，同年四月四人幫被捕，毛澤東的主要政治勢力乃宣告瓦解。隨後，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態產生改變，鄧小平的領導權在1978年12月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確立，從此鄧小平主義取代之前的毛澤東觀點。在此情況下中國大陸開始在經濟方面，進行如火如荼的開放與改革政策。當然，高教方面亦得加入改革的行列，必須配合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力，這也提供高教發展一個很好的契機。最明顯的是高校數量的快速擴張，根據何大任(民83)的資料，在1980年高校數僅有675所，但到了1985年已激增到1016所。

從以上鄭得興的研究中，可明確歸納出一個要點，即是中國大陸的政治情勢，對其高等教育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每一時期的教育政策明顯的反應出當時的政治情勢，而此種情勢又取決於領導者個人的主觀意識。其中主要的緣由在於中國大陸是專制體制，中國共產黨的決策變成社會運作的最高法則，而領導者所擁有的黨、政、軍權力往往遠超過其他人。這種情形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無論其發展方向或是空間，都是取決於一個或是少數的領導人，所以在質與量方面，高等教育發展均有暴起暴落的現象，處於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下，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前途猶如「看天吃飯的補魚人」。無論急速擴張與萎縮的取向，皆說明大陸高等教育政策搖擺不定，此種情形便連帶產生學校經費、設備、師資等的問題。

其次，黃政傑等（民 85）雖然與鄭得興的劃分期有異，但是亦主張以中共政治情勢及政策指導影響為依據，來劃分高等教育的發展。他們提出四個階段的觀點：

1. 1949 - 1954 年間的初步發展期：中共政權成立初期需求大量的高級人才，所以在此一時期高等教育的發展呈現兩種特色，即在「短期內」培育「大量的」人力，例如專科學校的修業年限規定為二至三年。另一方面學生數快速的激增，自 1949 年的 22,587 人到 1954 年擴增為 58,573 人，在者短短的五年間成長率超過兩倍半 (259.3%)。
2. 從 1955 年至 1970 年止的大起大落期：在時期呈現大起大落的原因，在於高等教育的發展，受到政治、經濟及政策的調整而大幅變動。如在 1955 年 5 月召開的全國文化教育會議，提出專修科應早日停辦的決議，致使專科生在高等校院學生的人數比率急速萎縮，從 1954 年的 23.2% 到 1957 年降到 10.8%，減少比率也超過兩倍 (214.8%)。然而，在隔年的大躍進時期，高等學校學生數大幅擴增 1.2 倍，專科學佔高校總學生數的比率，又恢復近乎 1954 年的水準達 21.4%，在 1961 年卻又降為不到 5%。單就自 1954 - 1958 四年短短的期間中，專科生數比率的波動程度上下高達四倍，這正反應出中國大陸政治對教育的強大影響力。
3. 界於 1971 與 1981 年間的調整撤銷期：文化大革命後期起，高等專科學校的發展處於調整的階段，如 1978 年時專科學生數增為 378,586 人，在高等學校學生數將近一半(44.3%)。之後政策上的調整限制招生，再加上部份專科學校升格為學院或大學，所以到 1981 年專科生降至 218,827 人 (17.1%)。

4. 1982 年之後的恢復發展期：此一時期的高等教育發展再度受到政策面改變的影響而改變，如 1982 年 12 月召開的中共全國五屆人大批准的「六五」計劃，明顯的造成專科學生數的另一波動，在 1980 年只有二十八萬人，到 1985 年已增加到四十萬人，增幅達 42.1%。

上述黃政傑等人的研究發現，又再度印證前面的論述。中國大陸當局對高等教育的發展，未能稟持一貫的政策。在每一個時期中大起大落的現象，致使高等教育問題叢生。其中關鍵所在是中國共產黨深陷於政治意識形態的泥淖，為追求社會主義的理想，對社會發展採取計劃性的控制，致使政治措施脫離人類活動的正常模式。人材培育計劃並不以社會常態發展為依歸，政治獨裁者的主觀意念往往決定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綱領。

類似上述研究者的觀點，楊深坑等（民 85）以文化大革命作為劃分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發展的依據，因為文革對大陸的教育造成嚴重的破壞，之後才進行重建與改革發展。所以他們將大陸高等教育的發展，劃分為 1949 年中共中央政府成立至文革前，及 1977 年文革後迄今兩個時期。前一階段的重心在於消除國民黨在學校的影響力，如廢除國民黨的黨義及訓導制度。並且執行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思想，這方面顯現在中共政協在 1949 年 9 月舉行第一屆全體會議所通過的「共同綱領」，其中將教育的主要目的定義為「為工農服務」。在文革前的期間中又可以依發展的段落性區分為 (1) 1949 - 1957 年的蘇化時期、(2) 1958 - 1960 年間的大躍進時期、(3) 1961 - 1964 年間的調整時期。從 1977 年之後屬於另一時期，因為鄧小平的政治勢力開始主導中國大陸社會的運作，鄧小平所主張的開放改革對高等教育產生兩個小階段的影響。(1) 1977 - 1982 年間的重建期：在此期間中共當局針

對高等教育，進行教育理論方針的重建，如「教育為無產階級服務」、「教育與勞動相結合」、「教育為生產力服務」等新教育方針的提出。其目的在於結束文革時期的政治掛帥，並以政治方式將社會導入。(2) 改革開放的階段，所以，自 1983 年至今的改革發展期被界定為下一時期。

此一段落的要點依然指向政治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宰制力，其中不同政治情勢下的政策轉變，直接的反射出政治上的意識形態，處於這種不確定的情境下，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實難有整體性正面的發展，當中包含著校際間品質的歧異性，其所引發的問題實值得加以深思。下文將依據上述這些研究，進一步探索相關的叢生問題。

第三節 啟示性

儘管以上三個研究對高等教育發展提出不同的劃分期，但是，其中的內容共同顯示出幾項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缺失：

1. **政治主導一切**：由上述可見，這些時期的劃分方式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勢力消長，及政策變化有直接的關聯。在每一個時期中，高等教育的急速發展或是萎縮，皆起因於政治勢力的消長。這種情形反應出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深受政治的牽引，此種特性固然亦存於一般民主體制的國家（姜添輝，民 86a）。然而，政治與教育的互動性往往參雜著經濟的因素，即教育的主要功能是被設計來滿足經濟的需求，若無法達成，經濟勢力會迫使政治對教育加以干涉。但是中國大陸高等教育與政治間的關係，卻不是呈現這種特性，而是政治勢力直接的主宰高等教育的發展。其中主要的緣由，

是因為中國大陸當局無論在政治或是政策上，進行的路線絕大部份是中國共產黨所決定的，而這種情形又與其奉行的社會主義思想有密切的關聯性。此種特性的啟示是，有必要進一步探討中國大陸的政治意識形態，及其對高等技職教育發展的影響性，這些方面將分別在第三章與第七章中作詳細的分析討論。

2. **教育政策搖擺不定**：在中國大陸政治勢力的消長中清楚的顯示出，領導者的主觀信念主宰整個社會的運作。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時期都是如此，即使現在與未來的後鄧時期恐怕都很難擺脫這種特性。其中主要徵結在於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是單元社會，黨的決策是最高的基本準則，而在這種決策過程中並未有真正民主的程序。相反的，決策往往是反應領導者主觀的一條鞭信念。當教育政策奉行每一時期強人的意念時，高教的發展常易呈現搖擺不定的現象。從高校數的發展情形便可印證此種論點，表一中的資料顯示出中國大陸的高校數並未有正常的發展，如從 1957 到 1960 年的短短三年中，高校數暴增超過五倍半 (562.9%)，隔五年之後卻又只剩約三分之一 (33.7%)。這種暴起暴落的情形，主要是受到當時大躍進政策的推動及後果所影響，這也顯示出政治情勢與決策的改變對高教發展有深遠的影響。由此種關聯性來推測，顯然高等技職教育的發展也無法避免此種影響，關於這方面將在第六章與第七章中有詳盡的論述與說明。

表一 1949 - 1985 年中國大陸高等學校數的發展狀況

年份	1949	1952	1957	1960	1965	1976	1980	1985
學校數	205	201	229	1289	434	392	675	1016

資料來源：轉引自何大任 (民 83) 論鄧小平教育觀與中共高等教育改革。頁 19。

表二 劉水深等 (民 85) 研究的二十三所樣本學校

北京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天津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	同濟大學	浙江大學	華中理工學院	華南理工學院
清華大學	北京工業大學	大連理工大學	復旦大學	上海財經大學	廈門大學	湖南大學	西安交通大學
對外經貿大學	南開大學	東北財經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南京大學	武漢大學	暨南大學	

3. 學校品質不一：這種高校數量的大起大落，意謂著學校品質良莠不齊。就如前面所論述的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帶給中國大陸極度的嚴重傷害，每下愈況的經濟蕭條景象自然不在話下。這種情形更連帶拖累其財政收入，所以高教也存著經費不足的現象。即使在 1978 年開始執行經貿開放改革政策後，許多年的經濟成長率皆是二位數字 (見表三)，此種經費嚴重不足的問題仍未解決。在劉水深等 (民 85) 的研究便有類似的發現。表二的二十三所高校為其研究對象，其中有十所是重點學校，其餘亦皆是在中國大陸的名校。若是這些學校仍有經費嚴重短缺的情形，其他學校的情況將更為嚴重。劉水深等進一步指出經費嚴重不足減低教學成效，如無法真正落實學生的實習。再者，也造成低品質的學校設備，如許多學校的設備因陋就簡。關於經費不足所形成的問題是，是否高等技職教育也面臨此類困境？再者這方面問題的影響性為何？特別在設備與圖書方面，因為這些項目直接影響到學校品質，這些問題將在第八章中作探討。

4. 師資問題：在前文中已陳述到，文化大革命造成人才的斷層，如許多的高級知識份子被清算鬥爭，在此段十年的期間中研究生減少十萬人，大專學生更高達百萬人以上。這種人才斷層的問題至今仍存在。如劉水深等 (民 85) 便發現許多上表中的學校，存有適任教師不足的情形。許多管理教育的師資並非來自本業，而從

其他專業轉入，其中有以經濟與工科為主。再者，各校教師的學歷水準也嚴重偏低，如在哈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學院、東北財經、大連理工、南開大擁有博士學位的教師，分別只有四、三、五、七位。這種師資問題更隨著薪資偏低，與市場經濟發達後急需人才的情況，而更形惡化，有許多教師放棄教職轉而投效私人機構。在清華大學擔任商科的教師，如財務會計、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市場營銷等，流失比率高達50%。這種師資問題所暗含的意義是，高等技職教育是否亦有此類問題？再者，這種問題對教學的影響性為何？特別是在教學成效與課程安排上，因為這些項目與教師的教學有緊密的關聯。關於這些問題在第八章與第十章中皆有相關的分析與探討。

總結這些問題的徵結所在，似乎直接與間接地指向中國大陸獨特的政治型態。就如前文所顯示的，高等教育主要在於配合經濟的政策，而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又深受其政治勢力與型態的影響。此種關聯性明顯顯露出高等教育、政治與經濟間有著緊密的交互作用。此種特性對研究高等技職教育發展的啟示性是，有必要進一步探討中國大陸的政治意識形態及其經濟政策，因為高等技職教育隸屬於高等教育的一部份，自然無法免除政治勢力的影響。再者，高等技職教育具有明顯的職業導向，其目標在於滿足經濟生產活動所需求的高素質勞動力（請見第七章與第九章），所以高等技職教育與經濟發展政策間必然有著相互緊扣的關聯性。關於中國大陸政治與經濟的政策、特性與影響，將在隨後的第三章、第四章與第五章中作詳細的分析。